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Today (Excerpt II)

By Alexander Fyfe
Translated by JIANG Qing

Received: July 7, 2023

Accepted: July 20,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Alexander Fyfe, trans. JIANG Qing. (2023).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Today (Excerpt II).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117–12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4](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4>

Abstract: Th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Marx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New Interventions,’ argues for the continued relevance of Marxist approaches within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After a discussion of the place of Marxism in the field today, a brief history of important Marxist interventions is provided,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paid to works by Omafume F. Onoge, Biodun Jeyifo, George M. Gugelberger, and Chidi Amut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nine essays (and one afterword) contained in this issue are introduced.

Keywords: Marxism; African literature; dialectics; African literary studies; Omafume F. Onoge; George M. Gugelberger; Chidi Amuta

Sour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frican Identities*, Volume 18, Issues 1–2, 2020.

Notes on the author: Alexander Fyfe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His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odern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subjectivity. His work has appeared in *Interv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and *the Cambridge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Literary Inquiry*.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JIANG Qing is an MTI student of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at Jishou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interest lies in translation. Her email is 626560713@qq.com.



馬克思主義與當今非洲文學研究

(節選二)

亞歷山大·費夫/文 蔣青/譯

摘要：本文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新的幹預》特刊，認為馬克思主義方法在非洲文學研究中仍然具有相關性。在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在該領域的地位之後，簡要介紹了重要的馬克思主義幹預的歷史，特別關注歐瑪福姆·弗賴迪·奧貢戈、比爾頓·傑伊弗、古格爾伯格和阿穆塔的作品。在此背景下，介紹了本期的九篇文章（和一篇後記）。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非洲文學；辯證法；非洲文學研究；歐瑪福姆·弗賴迪·奧貢戈；古格爾伯格；阿穆塔

譯者簡介：蔣青，吉首大學 MTI 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為翻譯理論與實踐。

約翰·馬斯特森(John Masterson)的文章致力於探討非洲都市主義、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言論之間的複雜聯系，以論證奇馬曼達·恩戈齊·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的《美國人》(*Americanah*, 2013 年)和因伯恩·馬布(Imbolo Mbue)的《看啊，追夢者》(*Behold the Dreamers*, 2016 年)『所討論的從非洲到北美大陸新自由主義話語核心的「矛盾和模糊性」』。雖然，非洲都市小說因對階級問題不甚敏感而飽受詬病，但馬斯特森表明，這兩個文本在與各種不同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一起閱讀時，實際上記錄了它們所處的奧巴馬時代新自由主義文化的社會矛盾。儘管這兩部小說都沒有明確的馬克思主義取向，但馬斯特森表明，它們還是談到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問題：「以它們獨特的方式，《美國人》和《看啊，追夢者》同樣被辯證的（如果是矛盾的）談判所推動，包括霸權和反霸權、地方和全球、物理學和形而上學，以及新自由主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是由其自身的活力所定義，即使沒有直接受到馬克思諸多流派的啟發，但也深受其影響。」^①在提及廣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有意識地關注馬克思主義對待非洲文學的歷史時，這篇文章使得我們重新思考非洲都市小說研究中的政治問題。

雖然非洲都市主義問題是當前非洲文學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但非洲文學與文學典籍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一個更長期的且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海莉·托特(Hayley Toth)和布蘭登·尼科爾斯(Brendon Nicholls)的文章完全參考了正典的新模式，特別關注種族隔離後的南非。他們的作品回避非洲文學與「西方正典」的聯系（和/或顛覆）以及進入「非洲文學」正典的適當標準的有些疲憊的問題。然而，他們的論點不是從南非開始，而是從黑格爾和辯證法的歷史時期開始。在對辯證法和黑格爾明確表達的對非洲人的偏見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細致的解讀之後，托特(Toth)和尼科爾斯(Nicholls)追溯了辯證法的價值^②，從《現象學》中著名的「主人——奴隸」/「領主——債券人」段落，到馬克思對其占有，以及後來史蒂夫·比科為黑人意識運動的目的而採用。他們表明，比科(Biko)的辯證法是通過與黑格爾、馬克思、法農(Fanon)和薩特(Sartre)的接觸來闡述的，他允許同時關注種族和階級的問題。他們認為，這需要重新評估以前對黑人意識運動的

馬克思主義批評,這些批評指責它將文化問題置於階級分析之上。比科對辯證法思想的部署所特有的交叉性為本文提出的一種「多神」辯證法,以重塑種族隔離時期的文學經典並在其容納交叉的複雜性。因此,這篇文章的貢獻是雙重的:它首先提供了對辯證法的解讀,通過承認和超越黑格爾的歐洲中心主義,證明了它在(南非)背景下的歷史作用和相關性。在七個「挑戰」過程中,托斯(Toth)和尼科爾斯(Nicholls)詳細闡述了一個關於南非經典文集的模型,該模型並非「源於一種確定的共識,而是在每一次面臨爭議或通過社會衝突途徑接近時重新凝聚.....多主義辯證法具備足夠的靈活性,以處理爭議和反應的複雜性,通過這些複雜性,經典文集得以形成並(無止境地)修訂。」因此,這篇文章的貢獻是雙重的:它首先提供了一種對辯證法的解讀,通過承認和超越黑格爾的歐洲中心主義,展示了它在(南非)背景下的歷史作用和相關性。其次,托斯和尼科爾斯鼓勵一種政治參與和堅定交叉性的經典文集表述,儘管該表述對後種族隔離時期的文學尤為相關,但它也有望成為我們閱讀和教授日益多樣化的非洲文本的參考模型。該論文關注的是辯證觀念對經典文集的影響方式,幫助我們超越目前構建非洲文學參與的製度界限,這證明了奧貢戈對「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致力於爭取藝術創作和批評結構民主化」的主張仍然具有持續的有效性(Onoge, 1985年,第60頁)。

亞當·邁爾(Adam Mayer)作為尼日利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考慮了伊博女性作家伊菲奧瑪·奧科耶(Ifeoma Okoye)以及她的1984年小說《無耳之人》(*Men Without Ears*)在當代伊博地區涉及新傳統統治問題的方式。在論文的前幾部分中,邁爾對「封建化」理論對後石油繁榮時期的伊博地區的相關性進行了重要的討論。通過這樣做,他有效地概述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並且他對「未成熟封建化」一詞的運用將引起跨學科領域的學者的興趣。轉向奧科耶的小說,邁爾認為,通過對主角奇戈(Chigo)的敘事關注,文本巧妙地揭示了當代伊博地區運作的複雜父權力量網絡。這裏特別關注「封建男性氣概」在維持「貨幣豐裕」背景下的階級差距中所起的作用。邁爾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文學作品(尤其是奧科耶的小說)在揭示性別和階級之間複雜聯系以及「揭秘」封建主義權力結構方面可以發揮重要的政治作用。

本期的三篇論文追求所謂的現實主義在非洲文學中的後續影響。當然,關於現實主義地位的爭論一直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一個長期特色,從弗裏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信中批判瑪格麗特·哈克尼斯(Margaret Harkness),到喬治·盧卡奇(Georg Lukács)過度幹預,再到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以及從事馬克思文論研究的其他學者產出的最新成果。^③雖然早期的非洲小說大多以現實主義敘事為基調,這些人物如:阿切貝(Achebe)、阿爾馬(Armah)和恩古吉(Ngũgĩ),但這種趨勢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有所減弱。^④事實上,當時期最著名的一些非洲小說——奧克里(Okri)(1991年)的《饑餓之路》(*The Famished Road*)、切尼·科克(Cheney-Coker)(1990年)的《阿盧辛·鄧巴的最後一次哈馬坦》(*The Last Harmattan of Alusine Dunbar*)和萊因(Laing)(1986/1988年)的《搜索甜美鄉村》(*Search Sweet Country*)都是以被確定為「魔幻現實主義」模式來寫作的。然而,近年來不僅出現了各種形式的現實主義敘事的復興,還對現實主義在非洲文學中的作用進行了批判性重新評估。^⑤雖然這三篇論文應該被視為這一趨勢的一部分,但它們也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被理解為對盧卡奇(Lukács)有關現實主義在非洲背景下的著作所帶來的影響進行處理的嘗試。

在他的論文中,托馬斯·沃勒(Thomas Waller)探討了WReC對「批判非現實主義」理論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在《綜合與不平衡發展:邁向世界文學新理論》一書中,WReC借用了邁克爾·洛伊(Michael Löwy)的這個術語(他本人將其解釋為與盧卡奇的批判現實主義相關)以便在世界體系的角度上解釋和闡釋資本



主義(半)邊緣地區產生的許多敘述的非現實主義特征。

對於沃勒(Waller)而言,批判非現實主義理論的歐洲起源引發了對「概念淵源與其所應用的文本情感結構之間的差異」的嚴肅問題。這是一個重要觀點:儘管批判非現實主義似乎關注半邊緣文學文本的敘事特殊性,但 WReC 試圖通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作來解釋它們,從而可能掩蓋非現實主義敘事特征的社會文化特殊性。為了「細化」WReC 對批判非現實主義的使用,沃勒首先追溯了洛伊理論的概念基礎,並通過討論克勞德·萊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詹姆遜(Jameson)的觀點,認為非現實主義構成了一種描繪和解決深刻社會和政治矛盾的努力。在涉及 WReC 的非現實主義時,他認為「在 WReC 對既是『統一』又是『不平等』的世界文學體系的訴求中,定位在文學文本中的決定性作用被忽視了。」為了展示如何「恢復(半)邊緣文化文本更具地方特色的特性,為 WReC 的批判非現實主義理論提供支持」,沃勒對翁賈基(Ondjaki)2012年的葡萄牙語小說《透明》進行了閱讀。儘管他闡明了敘事過程中主人公逐漸透明化與安哥拉「資源詛咒」的「結構性社會矛盾」之間的聯繫,從而支持了一種符合 WReC 風格的批判非現實主義解讀,但沃勒還指出了敘事中的其他方面,包括以斜體葡萄牙語呈現的恩本杜語演講,這些方面指向了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的更深層社會傳統,但並非完全被其決定。最終,沃勒認為,儘管批判非現實主義理論具有相當的實用性,但對非現實主義文學特征的更充分描述必須關注土著社會文化實踐和傳統。

艾米·裏德爾(Amy Riddle)探討了非洲文學中超自然現象(根據莫拉杜文·阿德朱姆比(Moradewun Adejunmobi)的理解,超自然現象是「未知和潛在的不可知或無法理解的事物」)與社會經濟危機的問題。雖然非洲寫作中的超自然元素經常被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忽視,至少在它們不被理解為具有與其他寫作模式相同的政治力量時如此,但裏德爾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超自然可能是某些作品中複雜性的源泉,因為它以現實主義無法企及的方式捕捉到了資本的運作。」盧卡奇(Lukács)在這裏是一個關鍵的對話者,裏德爾對超自然主義和自然主義之間的區別提供了重要的解釋,後者是盧卡奇構建並批判的。事實證明,她關注的這類文本與盧卡奇的現實主義版本更為相似,而不是與自然主義相似,因為它們揭示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真實現實。裏德爾對超自然現象的唯物主義方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她的論點,即它可以作為應對資本主義矛盾的一種方式:「超自然現象很適合捕捉到資本邏輯,因為它生動地敘述了生活在一個不可捉摸的系統中所帶來的不安,而這個系統自動地再生產了可怕的不平等。」她使用對弗洛拉·恩瓦帕(Flora Nwapa)的《埃弗魯》(*Efuru*)和易蔔拉欣·梅吉德(Ibrahim Meguid)的《茉莉花之家》(*House of Jasmine*)的閱讀進行了論證。這些文本來自非洲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重建的不同時期,但它們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都使用了超自然現象。在強調超自然現象如何作為各個社區體驗世界體系轉變的一種手段方面,裏德爾的論文與沃勒對社會矛盾與批判非現實主義之間關係的討論共享重要的共同基礎。

彼得·莫裏茨(Peter Maurits)的論文探討了現實主義與當代非洲科幻小說之間的關係,他將有關該文類在非洲文學中的角色的最新辯論與非洲文學研究領域中的現實主義的批判歷史聯繫起來。他特別關注奧貢戈的著作,並確定了對非洲現實主義的積極評價(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布萊希特和盧卡奇的觀點),因為它能夠揭示殖民主義的現實。他認為,這種對現實主義的偏愛的遺產在非洲科幻小說的公共和學術辯論中有所體現,並且在該文類的重要作品中以「形式上和敘述內部的緊張感以及現實主義方法」的形式存在。莫裏茨確定了當代非洲科幻小說中表現現實主義協商的兩種趨勢。第一種趨勢是他所稱的「數據之聲」,即將數據納入科幻小說中,而勞倫·貝克斯(Lauren Beukes)的 *Moxyland* (2009) 中的數據納入是「對捕捉和識

別現實問題的一種幾乎癡迷的參與」。第二種趨勢涉及科幻作家試圖利用該文類揭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體性,這一特征是盧卡奇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中的核心要素。莫裏茨在卡洛斯·多斯·桑托斯(Carlos dos Santos)、佩佩特拉(Pepetela)、埃卡裏·姆布溫杜拉(Ekari Mbvundula)和阿蔔杜拉曼·瓦貝裏(Abdourahman Waberi)的作品中發現了這種趨勢。

穆戈·穆希亞(Mugo Muhia)的論文討論了資本主義發展、環境退化和傳統生計方式之間的複雜關係,重點關注肯尼亞的馬賽人。穆希亞寫道:「馬賽人的現代歷史在很多方面上是與他們土地的疏離有關」,他描述了殖民和後殖民資本主義的侵占如何大大減少了馬賽人的放牧土地,並對他們的養牛實踐產生了不利影響。穆希亞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以及較近期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寫作,提供了對亨利·奧勒·庫萊特(Henry Ole Kulet)的《消失的獸群》(*Vanishing Herds*)的閱讀,展示了這本2011年小說通過「旅程主題」揭示了馬賽人失去土地和資本主義剝削之間的關係。最終,他考慮了主人公拒絕「將自己的生活方式讓渡給資本和利潤」的後果,以及這對於關於抵抗資本主義對環境破壞的討論意味著什麼。

馬克思主義在非洲歷史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非文學」寫作體裁在辯論和理論化的場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阿金·阿德索坎(Akin Adesokan)考慮了《非洲政治經濟評論》(*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ROAPE*)和約翰內斯堡理論與批評研討會(Johannesburg Workshop on Theory and Criticism)作為「智識倡議,其歷史與二十世紀最後15年非洲馬克思主義話語的變遷有關」(Adesokan, 2018, 第72頁)。這種工作的重要性在於為該領域提供對特定歷史時刻的理論和批評關鍵點的理解,同樣重要的是闡明了書面文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布拉欣·埃爾·古阿布利(Brahim El Guabli)的論文以摩洛哥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的「見證文學」為重點,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對後獨立摩洛哥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的出現提供了有用的描述之後,埃爾·古阿布利認為,三位前運動成員寫的回憶錄進行了重要的回顧性理論工作。他將這些文本定位為「見證文學」,這是一種為「抽象、論證和反論證」提供空間的體裁。他討論的這三本回憶錄在考慮馬克思列寧主義運動的成就和失敗時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理論方向。而阿蔔杜拉齊茲·特裏巴克(Abdelaziz Tribak)的書《伊拉爾·阿曼,一段苦難的屍檢》(*Ilal Amam, autopsie d'un calvaire*, 2009)對該運動持高度批評態度,質疑「他之前所在的政治組織項目的理論和實踐基礎」;而艾爾沙維(al-Shāwī, 2015)和亞伯拉罕·塞爾法蒂(Abraham Serfaty, 1998)則利用他們的文本來「理論化可能的替代方案,以在快速變化的政治背景下重新塑造摩洛哥左翼並賦予其新的政治角色」。除了對摩洛哥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貢獻外,埃爾·古阿布利的論文及時提醒我們非虛構寫作在重新評估革命運動的力量和構想未來政治可能性中所扮演的角色。

埃爾·古阿布利(El Guabli)分析了迄今為止在「非洲文學研究」主流中缺席的作家的作品,但重新評估那些在殖民化期間及其後不久出現並現在成為該領域經典人物的關鍵文學人物的政治觀點也同樣重要。事實上,關於如恩古吉(Ngũgĩ)、阿切貝(Achebe)、桑貝尼(Sembène)和索因卡(Soyinka)等擁有不同背景的作家的作品如何描繪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在不同馬克思主義思潮中的參與程度,還有很多話題需要討論。亞倫·巴特爾斯·斯溫德爾斯(Aaron Bartels-Swindells)的論文探討了阿伊·克韋·阿瑪(Ayi Kwei-Armah)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一關係在該作家的職業生涯中並不一致。他認為,阿瑪「看似對馬克思主義的拒絕和對革命性泛非洲主義的發明可以理解為與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互



動。」通過閱讀阿瑪在 1967 年至 1984 年間寫的幾篇文章, 巴特爾斯·斯溫德爾斯認為, 阿瑪通過他的「革命性的法農主義」(revolutionary Fanonism) 部分發展了一種以對階級鬥爭的理解為基礎的文化觀念, 隨後闡述了「重非洲化」概念, 將其視為「對馬克思主義具有挑戰性, 挑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種革命過程」。這對於我們理解阿瑪的文學實踐具有重要影響, 巴特爾斯·斯溫德爾斯提出了有趣的觀點, 即作者後來轉向歷史小說形式應該被理解為他對「重非洲化」越來越感興趣的一部分: 「阿瑪選擇歷史小說形式來敘述重非洲化, 因為他之前的小說已經消耗了現實主義在表達文化和意識變革方面的能力, 這是解殖必需的。」在對阿瑪的小說《碎片》(Fragments, 1969) 和《兩千個季節》(Two Thousand Seasons, 1973) 進行新的閱讀之後, 該論文以支持阿瑪特定的「黑人馬克思主義」對當前對種族化資本主義的批評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的論述結尾。

綜合而言, 本特刊中的論文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批評如何與非洲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同步發展。與古格爾伯格(Gugelberger)的《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一書將非洲文學理解為單一形式的標題不同, (該書反映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將非洲大陸的文學創作主要視為作品集合的傾向), 本特刊中的論文表明, 馬克思主義尤其適用於將文學作為在不同語境下發生的實踐進行思考。在這方面, 梅耶(Mayer)和裏德爾(Riddle)明確涉及到性別問題的貢獻具有重要意義, 這在古格爾伯格的著作和當時的其他馬克思主義批評中並不存在。然而, 本期作為案例展示的主要文本以及理論方法僅為未來馬克思主義與非洲文學交叉研究路徑拋磚引玉。我們在這裏看到了一個分散、持續且未完成的非洲文學與馬克思交叉研究的證據, 正如我曾試圖表明, 這仍然極為相關。尼爾·拉紮魯斯(Neil Lazarus)的尾聲追蹤了後殖民主義和非洲文學研究中解殖與馬克思主義學術命運的變化, 並提醒我們還有一些工作有待完成。他在文中總結時建議「與其試圖將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一勞永逸地固定在非歷史的位置上」, 更緊迫的任務是「尊重」廣泛歷史上非洲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重要人物的「革命承諾」。他似乎意在表明, 理論與實踐相輔相成, 且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功用」而非「定義」才應成為非洲文學領域中兩者持續對話的動力。

注釋

- ① 這句話的原始版本中包含了馬杜·克裏希南(Madhu Krishnan)和恩佐·特拉韋索(Enzo Traverso)的著作的文中引用。
- ② 借用於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2009年的著作《辯證法的價值》(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09年)的標題。
- ③ 請參閱恩格斯(Engels, 1888/2000)、盧卡奇(Lukács)在《美學與政治》(Aesthetics and Politics, 阿多諾等人, 2007)一書中的貢獻, 以及詹姆遜(Jameson, 2013)關於馬克思主義與現實主義交融的關鍵節點。
- ④ 當然, 這裏需要進行一些限定說明。並不是說在 20 世紀 80 年代之後就不再有現實主義敘事作品了, 而是超現實主義文學模式開始受到廣泛文學市場和評論家的隱式青睞。
- ⑤ 請參閱安德拉德(Andrade, 2009)關於非洲文學研究中現實主義的重要議題的討論。請參閱達利(Dalley, 2014)對歷史小說形式在非洲和後殖民小說中的作用的研究。

(Editors: Bonnie WANG & Ray)